

政治理论译丛

政治的终结

The End Of Politics

(美) 卡尔·博格斯 著
陈家刚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政 治 理 论 译 丛

政治的终结

[美] 卡尔·博格斯 著
陈家刚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的终结/(美)卡尔·博格斯著;陈国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2

(政治理论译丛)

ISBN 7-80149-616-7

I.政… II.①卡… ②陈… III.政治制度-研究-西方国家 IV.D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5579 号

政治理论译丛

政治的终结



著 者: [美] 卡尔·博格斯

译 者: 陈家刚

责任编辑: 严 波

责任校对: 李树兰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3.75

字 数: 324 千字

版 次: 2001 年12月第 1 版 2001 年12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ISBN 7-80149-616-7/D·094

定价: 25.0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1-0905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我在本书中所思考的问题可以恰当地描述为“危机中的危机”——过去大约 20 年间美国的政治话语与政治行为的极度衰败。而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人们曾以富有公开辩论、公民权、民主参与和公众参与政府决策这些美德而自豪。我的核心论题是，到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社会已日益非政治化，日益缺乏公民参与精神与公众责任感，现在，这种情景比最近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明显。大多数人民逐渐疏远了被普遍认为是腐败的、独裁的并且与我们时代最重要任务明显不相干的政治体制。具有讽刺意义和可预示的是，这种衰败发生在日益广泛的社会问题——环境恶化、城市生活质量下降、公共服务低劣、城市暴力的扩散和不断增长对私域的威胁——明确需要全面的和创造性政治干预的时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撇开最常规的政治领域本身的健康不说，公共领域的衰落对公民授权和社会变革具有潜在的毁灭性影响，并由此导致“危机中的危机”。再者，这种衰落不仅发生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而且也出现于高等教育、信息资源及交往不断发展的阶段。可悲的是，尽管人们能更方便地利用教育

设施和技术手段，但大多数人们似乎对在既有公共领域内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已失去了信心。可以想像，他们的这种状况是对极端腐化的政治体制的反应，在这种体制里两党之间的分野比以前更小，公民权也急剧衰落——像投票率的降低、普通公民中政治效能意识的崩溃，以及对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日益漠然（或无知）所反映的那样。

反政治的这种划时代胜利不仅只关涉领导的无能、政党的失败和运动的无效，也不仅是结构性安排失误，它同时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过程——与社会中公司扩张和经济全球化相关联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塑造了日常生活和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非政治化多少不可避免地是对一种体制的群众性反应，这种体制就是为排斥异己、私人化社会关系和缩小民主参与范围而设计的。

虽然本书的主题就是“政治”，但我的方法并不仅仅依靠政治研究或政治科学的原则——或者其他任何现代学术研究领域——来提供资料，因为我的论证并不遵循任何特定的话语模式。固有学术研究领域（及分支领域）片面的、专业性的和孤立的特点，会阻碍对当代困境的系统分析；实际上，学术上的先入之见常常与其说借助于将社会现实变为可操作性的（和通常是量化的）学术著作、理论和“方法”而使问题明晰化，倒不如说它歪曲和模糊了这些问题。在大多数学术领域，你会发现人们越来越反感“宏观”或全球事务，这种反感必然具有历史视野或者说超越了人为的学科界线。大多数政治科学领域中枯燥的著作于我这里要完成的任务毫无益处（考虑到政治科学至少在表面上是“政治的”科学，这门学科应该具备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洞察力以研究非政治化现象及其巨大影响，那么，这就极具讽刺意味了）。当然，有些政治学家的著作已证明有益于此项研究。但是，大部分著作深受老一套意识形态的影响，太过局限于范围和方法论，过于疏远其他学科领域及话语而对我们的研究没有太大的帮助。

这些缺点在日益增强的经济和技术（以及政治）全球化的时代越发令人不安。事实上，基本的政治定义不仅贯穿于政治科学，而且也贯穿于大多数的社会科学，但这种定义在理论上过于狭窄，在意识形态上过于保守以至于无法为我目前在本书中提出的广泛的批评留出空间。

在选择“政治的终结”这个题目时，我没有考虑过任何实际上的政治事业的终结——也没有考虑任何“意识形态的终结”或“历史的终结”——而是在比喻意义上指称反政治的时代思潮，这种思潮似乎能说明处于新旧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当然，一般意义上“政治”——选举活动，立法活动，公共政策，游说，总统命令等等——并没有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也没有失去其吸引媒体和公众注意力的能力。另外，各式各样的公民权和参与文化——政治活力的标志——可以在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群众斗争和社会运动中观察到，尽管它们是分散和孤立的，但仍然是美国政治与知识生活的重要部分。虽然政治并未完全从视野中消失，但曾经将我们关注点集中于诸如公民参与、公共利益、政治责任、社会治理和社区的充满活力的话语——自古希腊延续至今的传统的一部分的——衰退已经超越了我们认知能力。这种传统上对公民事务的关心已被一系列具有压倒优势的力量首要的是公司权力以及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的影响所颠覆。然而，由于世界范围上存在着体制与大量社会问题的冲突，可能与“政治的终结”的概念相联系的终结意识必须是特别适当的。在本书各章节讨论的非政治化过程是否最终被逆转，即我们是否能期望走向政治复兴目前还无法完全描述出来。

这项研究在目前还完成不了，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学术的”和非学术的。这种兼收并蓄的资源选择方式，不可避免地受问题的多重性所支配。虽然这种确认的事实可能被看做是对特定的“后现代”情结的妥协，但实际上它更多地承认政治永

远不会孤立，并且迟早会与人类生活的各方面相关联这一事实。缺乏历史学、经济学和心理学支撑的政治分析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甚至是无意义的。我希望这项研究能得益于这种有悖于学术传统的知识上的旁征博引。我要感谢那些在本书手稿完成过程中慷慨地付出时间和精力帮助我的人，他们是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劳伦·兰曼和卡伦·卢卡斯，以及《理论与社会》编辑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他们富于远见的评论和批评有助于我修正《大逃避》手稿——本书前身，发表于1997年11月。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两位合作者蒂娜·德曼和埃里克·马格努森，帮助重新思考和完善了部分章节。感谢全国各地长期以来关注我的著作并在知识和政治上给予我以支持的同事和朋友们，他们是巴巴拉·爱泼斯坦，丹尼斯·贾德，乔治·卡特斯亚菲卡，彼得·麦克拉伦，以及弗雷德·希夫。长期固定与达雷尔·哈姆马托的夜谈——无数的话题最终都归结为对美国政治状况的担忧——已成为我思考和个人灵感的特殊源泉。国立大学的同事给我的支持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虽然他们的研究领域与我相差甚远，他们仍然关注本书的进展。他们包括莫娜·阿弗里迪，汉斯·伯奇，莫尼卡·卡巴贾尔，道格拉斯·哈德塞尔，特里萨·拉金，彻里·刘易斯，卡伦·奥菲茨，汤姆·波拉德，弗兰·罗莎蒙德，詹姆斯·罗斯伯罗，艾戈·萨伯廷，道格·斯劳森，戴维·斯坦曼，以及罗斯·塔拉里克。我还要感谢国立大学给予我1997年大部分的休假时间，好让我在不受教学和其他事物干扰的情况下顺利完成这项计划。

本书提出的许多观点初次发表于我为周刊《洛杉矶农村观察》做专栏作家期间，后来作了进一步的修正。这一时期从1994年开始历时大约两年，此间与《观察》的编辑丹尼·费高德的密切关系对我有着特殊的影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的几个学生，特别是洛恩·丹，蒂娜·德曼，本·弗里莫，奥尔温·古斯塔夫森，克里斯蒂娜·哈赞，埃里克·马格努森，马克·内格

尔，马克斯·斯蒂芬和丹尼斯·赛在研究和做助手过程中提供了慷慨无私的帮助。从某些方面讲，最持久的支持来自那些经常对我的著作提出尖锐的批评和无尽鼓舞的朋友：辛西娅·佩纳，玛丽 J. 约翰逊，李·梅尔斯，丹尼·波斯特尔，玛丽娜·布伦南，约翰·桑伯恩玛苏，兰迪·桑德尔，布雷迪·沙利文和米尔特·沃尔平。将近 15 年间，流连于这个或那个咖啡馆时，我与布雷迪·沙利文关于政治的热烈讨论强迫我重新思考那些理所当然的前提。吉尔福德出版社编辑彼得·威索克和威廉姆·迈耶的作用——他们的耐心，支持和建议——是无法估价的。最后，我要感谢多里·刘易斯在此项看起来似乎无尽期工作中所给予的持续不断地鼓励和支持。

译者序

危机中的政治： 从衰落走向复兴

卡尔·博格斯，美国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在当代社会和政治理论、欧洲政治和民众运动领域著述颇丰。关于葛兰西这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博格斯就写有两本著作。博格斯的著作包括《欧洲共产主义的困境》（1982）、《两种革命：安东尼奥·葛兰西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困境》（1984），《社会运动和政治权力》（1986），《知识分子与现代性危机》（1993），以及《社会主义的传统》（1996）。博格斯曾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和华盛顿大学。过去十二年间，他一直是洛杉矶国立大学的社会科学教授。博格斯还是《洛杉矶农村观察》的专栏作家，并且主持洛杉矶 KPFK 的广播节目。博格斯在美国学术界享有盛誉。

《政治的终结》是博格斯 2000 年的又一力作，在这本划时代的著作中，博格斯主要通过对美国社会的深刻观察，详细阐述了美国社会中普遍的政治冷漠、公共领域以及公民权的衰落，以及这种衰落对民主的威胁。博格斯对此表现出深深的忧虑。此外，

他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在全球化条件下，随着社会危机、生态危机的加深，政治的复兴是否是可能的，以及实现政治复兴的条件。用博格斯的说法，就是，“确定美国政治衰败——丝毫没有减弱的历史趋势——的起源、构成和意义”。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衰败，或者反政治情结，同犬儒主义、绝望、不稳定，甚至对未来的恐惧等情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把这些情感当作“非理性”或“逃避主义”而忽略，那么，分析美国政治就会误入歧途。

政治及其话语传统

在博格斯看来，所谓政治，指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自由民主的传统，其中，对公民参与、公共利益、政治责任、社会治理和社区的关注是市民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自古希腊以来形成的传统。这种传统“崇尚公民权、公共领域、社区和社会治理这些积极的理想，这些理想对于任何一个民主社会的成长都是必不可少的。”它把政治看做是独特的、包容一切和充满生机的事业，对任何社会秩序的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理解政治还有另外的一种路径，即“政府或政治是积极的，服务于进步目标的实体”。政治是实现人类理想的载体。

自古希腊至今，公共领域、公民权、民主参与和公众参与政府决策作为美德而受到赞誉。政治塑造了一个独特的公共领域，其中人们可以共同集会，相互影响，形成决策，加强公民联系，实行必要的社会变革，最终追求一种德行的社会，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属于城邦的正义”。在亚氏思想中，政治是普遍的人类治理的源泉，这种治理对于追求生活的意义、方向和目的来说是必不可缺的。作为古希腊城邦的重要成分，政治等于是民主参与和共同治理的必要条件。

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发展，政治的话语传统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形态。

古希腊崇尚“公民”或“平民”生活的美德，他们力图在他们参与的世界中建构社会与公民权。对他们来说，正是在公共领域中，人类的社会、知识和政治的经验才可以得到充分的认识，公共社会和共同目标才可能优越于家庭、个人生活，以及职业的片面性与分裂性。因此，在博格斯看来，“古希腊人不仅将特定理想和观点的认知理解成个人选择的问题，而且还理解成独特的社会事务、利益以及责任之外的活动”。政治是公共的事务，共同的责任。

古希腊思想中政治的理念在卢梭的作品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卢梭相信，虽然政治过程的活动很复杂，但个体可以被单独地重塑。在某种程度上，卢梭的理想化世界比古希腊的理想世界更政治化，因为，他期望体现在“公意”中的社会集体力量终将战胜利己主义自我和地方忠诚的所有表现形式，至少在存在小型社会、前现代的纯朴、社会化财产关系这些合适条件的地方是如此。“公意”淹没了自我。法国大革命在追求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同时，也使暴力和极权发展到鼎盛。因此，博格斯认为，它在使政治理想化的同时，也使政治受到贬损。

此外，政治还涉及到公民权理想，积极参与公共领域能够赋予参与者更宽泛的社会认同意识和历史目的感，不管这些参与者是个体还是组织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民主体制也在不断拓展。虽然政治一直是精英的领域，但在公民权时代，因为普选权、宪政，以及开放动态的市民社会的发展，政治正经历着新的民主化阶段，因为国家体制开始容纳历史上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团体，民众决策的范围也逐渐扩大。所以，博格斯认为，“在这一历史背景中，政治可以被理解为为人民力求拓展

其认同形式、增强其归属感、加强其影响事件过程的能力，以及发挥重要作用的能力领域”。公民权赋予传统斗争以实质的和象征性意义，这种斗争反对极权统治，反对各种形式的社会等级。同时，它也公开反对占有性个人主义，因为这种自由主义会削弱公民权的基础，虽然这种自由主义是洛克、斯密以及本瑟姆建构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美国开国元勋的智慧和远见为实现政治理想建构了现实的宪政机制。

在特定的时期，政治话语也涉及到借助于权术、为了历史理想而创造性利用政治制度以争取社会变革的斗争。例如，国家主义通常与借助国家干预建构集体认同和目标的雅各宾派或准雅各宾派活动相联系；各种价值通过相对小的精英集团的活动而扩散，它们力图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这些雅各宾派动力见于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霍布斯的利维坦理念，马基雅维里关于意大利君主的想像，以及卢梭对公意的赞誉。博格斯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军事独裁以及后来的“极权民主”就是这种政治话语传统的典型代表。

对列宁来说，政治变成了在世界范围内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工具，它是柏拉图、马基雅维里，以及法国拿破仑军事独裁中存在的结构性冲动的延伸。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党将政治看做是决定性领域，通过它可以动员和统一各种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先锋队政党和革命国家中被奉为神圣的治国之术会赋予争取变革的运动以战略和规范的方向，由此对抗“资产阶级”多元主义的分裂逻辑。政治取得了相对于其他社会因素的优先权。

与众不同的是，葛兰西将政治理解成源于积极的、文明的、参与的公民之中的统一过程，而不是在精英优先权冲动中被利用的客观对象。这种观点基本上是一种修正过的雅各宾主义，它更符合大众的、地方性的、民主的反霸权力量。博格斯认为，“尽

管马克思强调逐渐展开的社会冲突在决定政治行为中的作用，而列宁则重视政治的优先性，但葛兰西想将这两种关切融合成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包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加于政治的巨大影响的认识。”因此“马基雅维里所做的是使一切回归政治”，回归权术，建立“强国”，“创造历史”。借助于政治，人类才能成为“真正历史戏剧中的主角”。在马基雅维里主义传统中，政治既非宗教也非科学，而是属于具体的世俗行为领域，其目的是为了创造美好的社会。对葛兰西来说，“只有政治才能创造策略和运动的可能性”。只有政治才能利用行动背后的民众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以实现某些理想，即社会主义。只有在政治领域中，才产生了“对自我的批判性理解”，人们关于当下和未来的深切关怀才被注意，人民才重归历史过程。而阿伦特则强调公共领域在赋予民主化过程、民众反对个人和政府集权斗争以力量中的推动作用，即“反对私人滥用公共权力的惟一办法存在于公共领域本身，存在于公共领域内的每一行为，存在于每一个进入公共领域的人所面临的透明度”。

上溯至古希腊的独特政治传统体现了人类经验中的高尚、创造性和变革。它包含着特定理想和目标，如果我们能够面对全球危机，那么，这些理想和目标必将重新恢复生机。在博格斯的著作中，他将这些主要的理想归纳为，对于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来说，“普遍适用于全体公民的社会和公民参与；借助公民参与的个人和集体授权的观点；通过社会治理的统治术和争取普遍利益的斗争；以及在民众运动结构中或通过它成为可能的对社会变革的支持”。同过去任何时代一样，这种内涵着政治传统的复杂且相互联系的各种思想和实践仍然是必要的。实际上，考虑到全球化的力量，它们在今天也许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或者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或卢梭和马克思的时代更为紧迫。

危机中的政治与公共领域

在美国历史上，人们曾以赋有公开辩论、公民权、民主参与和公众参与政府决策这些美德而自豪。不可否认，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人们拓展了新的参与空间，消除了公民权的许多结构和意识形态障碍。政治文化日益民主化。到20世纪60、70年代，政治文化不再是精英主义的和极权主义的，不再是种族主义的和父权制的，也不再拒绝来自公民社会的民主支持。民主政治似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政治话语与政治行为却处于极度衰败的状态之中，也就是博格斯所说的“危机中的危机”。传统上对公民事务的关心已被公司权力及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的影响所颠覆；选举政治失去了意义，政党之间的分野越来越小，公众话语热衷与生活琐碎；在民众看来，政治与媒体场面、政治丑闻、竞选欺骗、官僚机构、公司势力和腐败联系在一起。美国社会日益非政治化，日益缺乏公民参与精神与公众责任感，人民逐渐疏远了被普遍认为是腐败的、独裁的政治体制。人们走向文化“飞地”，组织小团体，反政治情结浓厚，公共领域衰落。戴维·克罗托指出，在美国，政治已经变成了遭受最大毁灭和贬损、最缺乏预见和变革性特征的活动。既有的政治体制为真正的政治参与提供的渠道或资源、空间越来越少，而且也无法给人们以未来的希望。

如果把这种衰落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考虑，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出现极具讽刺意味。因为，一方面，美国面临着日益广泛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恶化、城市生活质量下降、公共服务低劣、城市暴力的扩散，以及对私域的威胁等，这些社会问题恰好需要全面的和创造性的政治干预。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快速增

长，高等教育、信息资源及通讯不断发展。本来人们能够利用教育设施和技术手段，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但大多数人们似乎对在既有公共领域内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已失去了信心。事情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博格斯认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公共领域的衰落对公民授权和社会变革具有潜在的毁灭性影响，并由此导致‘危机中的危机’”。反政治情结的出现不仅只关涉领导的无能、政党的失败和运动的无效，也不仅是结构性安排失误，它同时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过程：公司扩张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社会危机的加深。这个过程实际上决定了日常生活和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

博格斯认为，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一般来说具有五个特征，即，明确地逃避政治领域；公民权和民主参与价值的衰落；公共话语的萎缩和独立思想的腐蚀；通过权术或社会治理实现社会变革的能力的削弱；以及最终缺乏对什么是独一无二的公共领域，竞争的个人和地方性要求之间相互影响中形成的普遍利益的社会理解。反政治的主要形式有：①与治疗性文化特征相一致的对自我实现的内在关切；②以超验术语界定的对个人或精神价值的形而上学的追求；③孤立的、地方化的斗争；④短命的、自发的集体行动；⑤孤立的恐怖主义行为和随意的暴力；⑥相信技术理性能够解决社会问题；⑦关注虚无主义、逃避社会和悲观主义的知识系统（后现代主义就是一例）。这些表述仍然是不固定的、可变的，并且随着历史条件开辟新的政治机会而必将重新概念化。

虽然在美国社会中出现了公共领域衰落和政治衰落的趋势，但是，在博格斯看来，一般意义上“政治”——选举活动，立法活动，公共政策，游说，总统命令等等——并没有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也没有失去其吸引媒体和公众注意力的能力。另外，作为政治生命力标志的公民权和参与文化仍然是美国政治与知识生活的重要部分。超出我们认知能力的是公民参与、公共利益、政治

责任、社会治理和社区话语，它们是自古希腊延续至今的传统的一部分。它们被一系列具有压倒优势的力量，如公司权力以及经济全球化、以及社会危机所颠覆。“我使用‘衰落’一词，指的是深层的非政治化的历史过程，公民参与和社会治理的缺失，日益狭隘的公共话语，以及对古希腊人、卢梭、潘恩和杰弗逊等人来说极具价值的政治社会的消逝”。

政治衰败的原因

不管是政治衰败、公共领域衰落，还是反政治情结的普遍盛行，所有这些在博格斯看来都源于当代世界范围的社会和生态危机、经济全球化，以及古典意识形态如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衰落。贫富差距的扩大，邪教、暴力团体、民兵组织和城市暴力的蔓延使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资源耗竭、人口膨胀、森林滥伐、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全球变暖、极端的贫困和饥谨让全球生态系统不堪重负。系统性的、全球性的社会和生态危机，反映了人类社会自身，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非平衡状态。这种非平衡状态转移了公众的关注点，它使人们逐渐疏离政治，逃避政治，公共领域完全非政治化了。冷漠的个体越来越感到被异化和软弱无力，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原子化的社会。

其次，在日益恶化的社会和生态危机需要广泛和创造性政治解决途径的时代，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和公司权力的影响削弱了公民责任、民主参与，以及公共决策的基础。经济全球化使精英攫取了政治权力，侵占了政治领域。公司日益增长的影响实际上渗透到现代美国生活的各个角落，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力量又强化了这种趋势。掠夺性的特权、权力体制从许多方面侵蚀着自身越来越不稳定的基础。

博格斯认为，没有什么比公司扩张的过程更能削弱公共领域的基础、抽取政治话语的精华的了。公司的权力和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政治的方向，“它们在公共领域中维持意识形态霸权的能力从质量上讲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因此，公司政治话语霸权对民主参与来说具有毁灭性的影响。这种霸权使人们只关注生产率、利率、公司业绩、通货膨胀及个人生活，而排除了对真正社会问题如环境和贫困的关注，“自私和贪婪变成了易于接受的行为标准”。在“大政府”趋于衰落、“大公司”占据历史舞台中心的时代，在苏东共产主义体制崩溃后“自由市场”被视为惟一理性选择的时代，在完全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中，华丽的奇观和声色犬马取代了严肃的政治辩论，取代了真正的民众参与。

再者，现代世界政治的崩溃最终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失败，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甚至自由主义，以及宗教都因其自身深层的矛盾而陷于困境。博格斯坚持自由民主的观念，对自由资本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正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导致了社会的混乱与分裂，导致了公共领域的非政治化，导致了反政治情结的普遍化。现代自由资本主义崇尚个人竞争、社会自治、以及自由和开放的公共领域，但是，全球化的发展和公司扩张的现实却产生了自身的对立面：混乱和分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民主参与变成了一种幻想，公共领域完全变成了非政治化的”。尽管自由资本主义是官方意识形态，但是，当真正的民主治理形式威胁到既得利益集团时，它就会站在对立的立场上。美国政治体制已经越来越远离其合法的民主、自由和公民参与的理想。社会主义理论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指导着人们的实践，但是，斯大林模式的解体使这种意识形态处于困境之中。而国家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也因其极权和专制而崩溃。总之，“一个世纪以来决定公共领域发展方向的宏观历史话语留下了巨大的真